

# 国内企业管理案例研究的 进展回顾与改进步骤<sup>\*</sup>

——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综述

□张 霞 毛基业

**摘要**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本届案例论坛 ,之后对近五届案例论坛收录的论文进行分析比较。通过内容分析与文献研究 ,本文发现本土案例研究在过去的5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规范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总体上仍然理论贡献不足 ,原因在于研究者在案例研究的几个关键环节上没有做到位。因此 ,本文就理论抽样、数据分析和与现有理论比较等关键步骤给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 :案例研究 理论抽样 数据分析 理论贡献

## 一、引言

管理学案例研究在国内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 (以下简称案例论坛)从创立起 ,始终坚持的定位是汇集国内顶尖案例研究成果、致力于为那些专注通过深度剖析管理现象以归纳式探索本土管理理论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打造本土管理理论构建的最高水平论坛。因此论坛采用最严格的 双向匿名评审 ,给作者详细专业的评审意见 ,并逐渐形成严谨的最佳论文评审程序。论坛来稿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 ,从2007年的62篇研究型案例到2011年的107篇 ,稿源从5年前的40个单位发展到2011年的94个。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内管理学界案例研究水平的提高 ,更是本土理论构建研究能力的成长。

因此 ,我们认为案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研究策略的意义和潜在科学贡献在国内已经广为接受 ,不容质疑。国内案例研究者也普遍对案例研究的规范有了一定了解。佐证之一就是过去五届案例论坛的论文质量的大幅提升和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在基本解决了案例研究的认可和初步规范问题之后的此时 ,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 ,案例研究是否提出了有趣的研究问题? 数据分析过程是否足够严谨? 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 目前答案还并不十分肯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国外管理学界则相对比较肯定。构建理论和检验理论被认为是实证研究论文产生理论贡献的两条根本途径(Colquitt and Zapata-Phelan ,2007)。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之一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在1963~2007年近5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 ,理论检验型和理论构建型的论文数目都在逐年增长(Colquitt and Zapata-Phelan ,2007)。理论构建型研究通常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归纳式研究 ,也包括假说演绎式的实证论文。理论构建型论文虽然一直少于理论检验型论文 ,但差距越来越缩小 ,到2007年 ,两者的数量几乎接近。这一结论有力地证明了高水平国际期刊以及学者对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的重视和支持(Lee ,2001 ;Gephart ,2004 ;Eisenhardt ,1989 ;Eisenhardt and Graebner ,

<sup>\*</sup>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70888001) ,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0XNL014)。

2007)。

然而,近5年来本土案例研究在哪些具体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为此,在对本届案例论坛回顾之后,本文对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给出改进步骤。

## 二、论坛的主要观点和概况

本届论坛邀请了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Jeffrey A. Martin 教授等专家,为与会者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Martin 教授具有丰富的案例研究经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 Kathleen Eisenhardt 教授,曾和 Stephen Barley 和 Robert Sutton 等著名案例研究专家一起工作过。他为论坛做了两场主题报告,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Martin 教授从一般定性研究入手,介绍了定性研究的几种类型,特别强调定性数据的研究、归纳研究、比较案例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等虽属于不同类别的定性研究方法,但相互之间有重叠。在实际运用中,研究者常常组合运用这几种研究类型,但如何组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模板。这并不是说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随便地堆砌在一起,而是需要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得出更有意义的真理。Martin 进一步指出对定性研究而言:(1)分析层次可以是个体、团队和组织;(2)样本规模可以是一个、几个或者许多个;(3)数据收集可以通过民族志、文档或者面对面访谈;(4)数据分析的手段可以是归纳法、演绎法或者两者相结合,可以用定性数据分析,也可以用定量的统计方法;(5)最后的理论模型可以是过程模型,也可以是因素模型,或者两者的结合。事实上,案例论坛的稿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定性数据的研究但并非案例研究。Martin 教授重点介绍了多案例比较研究,作为定性研究的一个主要类型。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了从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到最后写作和发表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据收集方面,Martin 教授认为,访谈时要使被访者专注于叙述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或亲眼看到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应该防止让他们去描述那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事情,例如在他们没有参加的会议上发生了什

么。此外,通常要避免提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找出事件背后的原因不是被访者的任务,而是研究者自己的工作(分析数据、解释关系,从数据中推导)。此外,数据收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次的数据收集工作应能转化为几篇论文。

在数据分析方面,Martin 教授认为,所收集数据/证据的力度来源于跨案例之间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复制逻辑。从相似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模式,能保证作者不会因为某个鲜活的特例而心猿意马。

Martin 教授特别强调了寻找能指导案例研究的理论的必要性。他认为几乎没人能够宣称某个研究没有现存理论依据,文献中总能找到一些相关理论,可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数据分析中。因此,研究者应该去探寻现有文献的缺陷,而不能说没有相关文献。这样做有两重意义。首先,这能给读者

我们的最初评审人——一个框架来理解我们的研究贡献;这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专注于自己想要做的贡献。如果没有聚焦,那么研究者就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可能产生的众多贡献中摇摆不定,导致最终没有完整地建立基于其中任何一个发现的理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潘善琳(Shan Ling PAN)教授做了题为“将企业实践提炼为学术论文:结构化、实用化、情景化(SPS)案例研究方法”的专题报告。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李平(Peter Ping Li)教授分享了其倡导的阴阳案例研究方法。他认为案例研究是开展本土化研究所必需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当某个学术研究领域内存在差异较大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理论观点相互冲突时,阴阳案例研究法非常适合研究人员创建整合式的新理论。

在案例教学方法模块,厦门大学的沈艺峰教授剖析了案例教学的本质。复旦大学的包季鸣教授提出案例教学要体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体现学员的现实需求,通过即时性、进行性、追踪性案例来达到案例教学的效果。台湾大学管理学院的李吉仁教授对案例教学的定位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浸会大学 Michael Young 教授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付莘研究员分享了教学案例写作和课堂使用的经验和教训。

本届案例论坛共收到来自海内外94所院校的123篇稿件。经过程序委员会的初筛和评审专家的双向匿名评审,最终收录论文集65篇,其中研究型案例45篇,理论构建研究论文13篇,教学型案例7篇。分论坛报告研究型案例23篇(实际录取率为26%);理论构建研究8篇;教学型案例7篇。论坛程序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以双向匿名方式经过两轮投票排序,评选出9篇最佳论文(其中6篇研究型案例、3篇教学型案例)。

因篇幅关系,本文仅简要介绍6篇获奖研究型论文。其中周江华等(2011)通过多案例研究(7家企业)深入剖析了我国山寨手机行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BoP(Bottom of Pyramid,金字塔底层)市场开展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于天远和吴能全(2011)以珠三角地区的三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结合使用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阐释了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与组织文化变革历程的关系。王世权等(2011)针对理论上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尚未理清的事实,对海信集团及其主要的13家子公司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于春玲等(2011)以上海家化、云南白药和晨光文具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了中国情境下成功品牌延伸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郑晓明等(2011)基于二元能力的理论视角,以海底捞公司发展历程为案例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促进企业服务敏捷性形成的特征、过程和原因。王欢和汤谷良(2011)通过案例研究发掘了双汇成功实施MBO的一系列要素,通过双汇MBO路径创新的典型案例验证和补充了原有的MBO理论框架。

### 三、近5年案例研究 论文规范性分析

这里,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毛基业和张霞(2008)借鉴Dubé和Paré(2003)的方法所归纳的案例研究规范性指标,来评估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的质量。这套指标便于使得案例研究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都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尽可能避免研究人员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这些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是我们进行案例研究时的参

照,也可以用来评价一项案例研究是否达到了规范化要求(毛基业、张霞,2008,p.118)。考虑到每年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篇数不一,因此我们这里只给出百分比结果(表1)。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5年来论坛的研究型案例在各项规范性指标上几乎逐年提高。进步最为明显的方面包括明确的研究问题、说明相关理论、基于团队的研究、采用多种收集方法、引用原始证据。而有些方面相对仍然不足,特别是数据收集程序、数据分析过程,以及与现有理论比较。考虑到有些规范性指标是笼统的评价,为获知更多的细节信息,以本届论坛报告的论文为样本,我们有如下进一步的发现。

研究问题方面。研究问题可以具体说明研究者试图想要知道或理解什么(Maxwell,2005),此外还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帮助研究者聚焦研究和指导实施研究(Miles and Huberman,1994)。可喜的是本届论坛报告的案例中只有个别的没有清楚表述其研究问题,但也有个别论文,虽然提出了研究问题,但过于发散。研究问题所引致的研究必须是真正可以实施的,也必须是读者读完研究论文之后能够得到解答的问题(Maxwell,2005)。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案例研究都应该回答一个或若干具体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好在引言中就明确告诉读者。

理论基础方面。案例论坛一贯强调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毛基业、李晓燕,2010)。我们看到本届论坛报告的每篇案例都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但也发现一些研究在指出缺乏对某现象的研究之后,所回顾的理论仅是走过场,没有指出现

表1 2007~2011年“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研究型案例规范性比较

规范性指标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明确研究问题	56%	62%	74%	80%	86%
说明相关理论	50%	76%	91%	100%	100%
多案例设计	17%	43%	35%	44%	48%
明确的分析单元	11%	20%	48%	44%	66%
基于团队的研究	0%	19%	61%	80%	86%
说明数据收集程序	33%	95%	52%	67%	83%
采用多种收集方法	44%	90%	70%	74%	93%
证据三角形	28%	29%	57%	44%	58%
说明数据处理过程	0%	43%	39%	44%	52%
实地记录、对原始数据编码、数据展示	78%	90%	83%	86%	90%
分析策略(模式匹配、时间序列分析)	39%	57%	70%	70%	90%
数据之间逻辑关系	56%	57%	70%	67%	86%
引用原始证据	33%	29%	39%	56%	72%
比较现有理论	50%	40%	30%	33%	45%



有理论能够解释哪些方面、缺口在哪里、为什么现有理论没有对该现象给出满意的解释?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理论驱动型,也可以是现象驱动型(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对于那些由现象驱动的研究问题来说,研究者必须强调此现象的重要性和现有理论的贫乏(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理论抽样方面。数据收集的第一个步骤是确定数据来源,即案例对象的选择。案例的选择要符合理论抽样(Glaser and Strauss, 1967),而非统计抽样。有些研究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不太考虑案例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而是有选择知名企业的倾向。本届论坛中案例对象更加多样化、有趣和独特,但是多数作者却没有清楚交代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即没有说明理论抽样过程。

数据分析方面。样本论文中多数作者都会交代自己的数据分析方法,但有些只是简单交代了一下步骤。即使有些作者宣称自己采用了扎根理论中的三步编码法(Strauss and Corbin, 1998),或者是采用从经典案例研究文献中归纳出的其他数据分析方法,但读者看到的只是机械的模仿,而没有看到诸如以下信息:理论如何指导了作者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过程中产生了哪些中间构念和最终构念(甚至要给出数量),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的。

与现有理论比较方面。案例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构建新的理论,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征是将涌现的概念、理论或假说同现有文献进行比较(Eisenhardt, 1989)。样本论文中有很多尽管理论回顾很到位、案例数据也很丰富、数据分析也很严谨,但最后一步,只是匆匆做个总结便以此结束,以至于读者无从知晓此案例研究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例如对哪些现有理论进行了修正或情境化。

上述问题是导致本土案例研究在规范性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做出太多有意义的理论贡献的关键。如果说从提出研究问题到最后产生理论贡献要经历若干紧密相连的环节,那么唯有每个环节都科学有效,才能最终产生有意义的理论贡献。而目前的案例研究经常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出现断层。接下来,我们就这几个关键环节给出改进建议。

## 四、若干关键环节的改善方法和范例

近几届论坛综述都采用了范文分析的方法(潘臻、毛基业, 2009;毛基业、李晓燕, 2010;黄江明等, 2011)。所有这些范文分析结合到一起,在案例研究的诸多环节和方面给案例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系统和可操作化的方法示范。同样,为更好地说明如何改善理论贡献不足的几个关键环节的方法,本文直接引用历届论坛综述中已有的相关范文分析,也以本届论坛的相关最佳论文为例。

(一)从研究问题出发找到与之匹配的数据:理论抽样

尽管本届论坛几乎所有的案例研究论文都提出了明确的研究问题,但为回答研究问题而选择研究对象时,却较少有能说清楚选择某个案例的原因和依据,也就是没有做到案例研究中的理论抽样(Glaser and Strauss, 1967)。事实上,抽样对后来的资料分析至关重要——你要决定去观察谁,和谁说话,何时,何地,谈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都会影响你的研究结论可应用的范围,以及你和他人对研究结论有多大的信心(Miles and Huberman, 1994, p.27)。但案例研究的抽样与定量研究的抽样有很大的不同。定量研究为寻求统计学上的意义,需要大样本的随机抽样。而案例研究通常采用目的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

案例研究的这种目的抽样通常都是理论引导取向的(Miles and Huberman, 1994),无论是最初的抽样,还是研究进行过程当中发生的抽样(例如,扎根理论方法论中的理论抽样,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Strauss and Corbin, 1998)。正如 Firestone (1993)指出的,从案例研究中产生的最有意义的可一般化的理论是从实地资料中分析得出的,而不在于它能由样本推及总体。案例研究目的通常是构建理论而不是检验理论,所以理论抽样是合适的(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相对直接,所选案例是因为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启发性、或是极端的范例、或是难得的研究机会(Yin, 2003; 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案例论坛的很多论文都不符合这个原则,至少没有展示给读者令人兴奋和有趣

的现象。我们给有趣下的定义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即通常意想不到,但基于数据和理论的逻辑推理显示出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理论意义上的有趣(theoretically interesting)指的是与现有理论不完全一致,但对现有理论有修正价值。多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更为复杂,案例的选择不是基于特定案例的独特性,而更多基于案例群对理论构建的贡献,或者说多案例的选择是基于理论原因,如可重复性、理论拓展、对立重复以及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Yin, 2003; 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此外,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理论抽样无法在一开始时就明确,而是随着实地研究的展开而发展。也就是说,研究者进入实地后,观察到的现象会引导研究者对后续研究现象的选择,以便做比较。这就需要作者对理论和文献的熟悉,能够慧眼识珠,找到案例中有潜在理论贡献的现象。

Ozcan 和 Eisenhardt(2009)以及 Santos 和 Eisenhardt(2009)都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理论抽样的过程(具体参见毛基业和李晓燕的范文分析,2010, p. 110~111)。本届论坛的最佳论文之一也详细介绍了理论抽样的过程(于天远、吴能全,2011)。作者的目的是要构建民营高科技企业的组织文化变革模型,因此只选取中国境内民营企业作为样本,进一步选取珠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作为样本的原因是:(1)尽量消除地区和任务性质这两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而实现复制逻辑;(2)珠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较为发达,一定程度上代表先进生产力;样本企业来自深圳和珠海市,珠海经济相对落后,与内地某些城市情况接近,因此结论可能也可以推广到内地一些地区;(3)作者调研便利。最终选择了两家中小型企业、一家大中型企业,原因在于民营高科技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但是在完成了对两家中小型企业的案例研究后,作者提炼出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这一情境变量,而在这一变量约束下,这两家中小型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因而不能提供有关中国企业未来成长路径的线索。因此,作者对第三个样本的选择又增加了两条标准:大中型企业和有较高的绩效水平。最终,这3个样本各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从丰富的数据中科学地归纳出结论: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任务之一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分

析策略(也是如何展示分析结论的策略)。通常来讲有两种策略:时间序列分析和模式匹配分析。前者产生的往往是过程模型(Mohr, 1982),单案例研究通常较为适合采用这种分析策略(Yin, 2003),其优势是能讲好的故事、提供丰富的情境描述和揭示复杂的关系(黄江明等,2011)。而在多案例研究中模式匹配分析更受推崇(Eisenhardt, 1989),其结果往往是因素模型(Mohr, 1982)。因素模型向人们展示的是同一时间点上前因变量如何预测后果变量,而过程模型则侧重于解释如何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得到结果变量(Markus and Robey, 1988)。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可以和平共存(Mohr, 1982)。因此,案例研究中这两种策略可以联合运用。

数据分析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工作是如何从所收集的海量数据中编码归纳出理论。最为人们熟知的编码方法是扎根理论中的三步编码法(Strauss and Corbin, 1998),也有学者开发了其他的编码分析方法(潘绵臻、毛基业,2009)。这些方法本质相同,这里我们仅以扎根理论编码法为例,来说明研究问题和相关理论在编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步开放式编码阶段(或其他方法的类似步骤中),相关理论无需出现,也就是研究者需要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不受任何理论影响地去阅读访谈数据中的每一句话,然后尽可能使用客观(例如被访者自己的语言)和确切的词汇进行概念化。有时概念化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那么研究者可以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概念化,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这样就得到了很多初始概念(也可称之为“一阶概念”),这些初始概念未必都对最终形成的新理论有作用,但在这第一步我们必须不挑不拣,尽可能地把它们全部归纳出来,也就是说要把访谈数据中所有的原始信息都概念化反映出来。

第二步主轴编码阶段,研究者可以采取例如条件、行动、结果这样的逻辑关系来寻找初始概念之间的联系,这样所有的初始概念三五成群地被整合成若干轴线,出现了更高一层的概念(也可称之为“二阶概念”)。与第一步开放式编码中的“客观态度”不同,这一步会出现“哪些概念、可以按照什么逻辑关系组成一个轴线”的问题,回答该问题就必然有主观性。研究者需要自己判断和回答,而判断的依据便是研究问题和相关理论。研

## 国内企业管理案例研究的进展回顾与改进步骤

### 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

研究者在找轴线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与研究问题比较、与相关理论比较。在这个不断比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某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才能尽可能地确保找出来的轴线是合理的,并且那些和研究问题不相关的初始概念在这个阶段就被识别出来剔除掉了。

最后一步是选择编码阶段。在第二步主轴编码之后,若干条轴线已经呈现出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轴线对最终要构建的新理论都有意义吗?这些轴线之间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最终的理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又离不开与研究问题和现有理论比较。通过不断的比较之后,核心轴线被保留并且以某种逻辑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最终的新理论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案例论文的数据分析和结果展示部分,很多作者只是单纯地叙述在研究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但其实这部分内容是要展现通过案例研究得来的新的理论模型。因此,规范的做法是根据构建中的理论的核心概念来展示数据(参见潘绵臻和毛基业关于数据编码的范文分析,2009)。

本届论坛的最佳论文在数据分析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周江华等(2011)。针对企业如何在BoP(Bottom of Pyramid,金字塔底层)市场开展破坏性创新的研究问题,作者首先运用理论抽样原则决定以山寨手机行业中的7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数据分析中运用的是扎根理论的三步分析法。首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作者将资料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得到了79个初始范畴(一阶概念);在主轴编码阶段,作者采用了条件/行动/互动结果范式将初始范畴整合成若干轴线,在不断的比较中,79个初始范畴被重新整合为39个副范畴并归纳到了8个主范畴当中(二阶概念);在选择编码阶段,作者进一步将8个范畴与已有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例如新价值主张等4个二阶概念反映了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为BoP群体提出新价值主张的过程,分别代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同维度,具有理论一致性,因此作者将其归入商业模式创新这一核心范畴中;如此下去,直至得到最终的理论模型。上述3个编码步骤并非不可回溯,而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进行研究问题、理论和原始数据之间的比较,一旦发

现不合理之处,则回头重新编码。

#### (三)凸显案例研究的贡献:与现有理论比较

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征是将涌现的概念、理论或假说同现有文献进行比较,包括探究有什么相同之处、什么矛盾之处,以及原因是什么(Eisenhardt, 1989)。这样做有助于提高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内部效度、普适性和理论水平(Eisenhardt, 1989)。比较对象可以是与涌现理论相矛盾的文献,因为与现有文献冲突意味着机会,会迫使研究人员采用更具创新性、突破性的思考模式,也能精确界定当下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范围。此外,比较对象也可以是与涌现理论相似的文献,因为这能将那些通常互不相干的现象通过内在的相似性联系起来,由此得出的结论常常是具有更强的内部效度、更广泛的普适性和更高层级的概念(Eisenhardt, 1989)。

关于这方面的优秀范文,请参见Eisenhardt(1989)以及毛基业和李晓燕(2010)分析的范文。本届论坛的最佳论文在这方面都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因此我们不再做范例分析。这也正好说明这一步是亟待提高的。

## 五、结论

本文对本届案例论坛的回顾和对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的分析显示,本土管理案例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步之速度就像中国经济发展一样令人惊叹。短短数载,本土案例研究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到现在有些研究已呈现出了国际范。在规范性的诸多方面,我们看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提高,对有些规范性要求,有些工作还只是停留于表面,没有做精和做到神似,而所缺乏的画龙点睛之笔往往是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在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一系列紧密相连的过程环节上,一些关键环节上出现了断层,主要包括:(1)有了具体的研究问题,却没有进行理论抽样,从而找到与研究问题匹配的数据;(2)即使有了好的数据,却没有在研究问题和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得出研究结论;(3)即使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却没有将之与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从而凸显自己的理论贡献。针对这3个关键问题,本文给出了改进的方法和范文。随着规范性的不断提高,本土管理案例研究一定能



够归纳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达到与国际同行分享的质量标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 参考文献

(1)黄江明、李亮、王伟:《案例研究:从好的故事到好的理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0)综述》,《管理世界》,2011年第2期。

(2)毛基业、李晓燕:《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2009)综述与范文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3)毛基业、张霞:《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及现状评估——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2007)综述》,《管理世界》,2008年第4期。

(4)潘绵臻、毛基业:《再探案例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2008)综述与范文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

(5)周江华、仝允桓、李纪珍:《面向BOP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理——基于山寨手机行业的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6)于天远、吴能全:《民营高科技企业组织文化变革:一个多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7)王世权、武立东、王丹:《母子公司关系网络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基于海信集团的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8)于春玲、李飞、薛镭、陈浩:《中国情境下成功品牌延伸的影响因素探索——基于上海家化、云南白药和晨光文具的多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9)郑晓明、丁玲、欧阳桃花:《二元能力促进企业服务敏捷性——海底捞公司发展历程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10)王欢、汤谷良:《借道 MBO:路径创新还是制度缺失?——基于双汇 MBO 的探索性案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理论构建研究论坛(2011)暨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管理论坛 研究型案例论文集》,2011年。

(11) Colquitt, J. A. and Zapata-Phelan, C. P., 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6), pp. 1281~1303.

(12) Dubé, L. and Paré, G., 2003, Rigor in Information Systems Positivist Case Research: Current Practices, Trends and Recommendations, *MIS Quarterly* 27(4), pp. 597~635.

(13) Eisenhardt, K.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pp. 532~550.

(14) Eisenhardt, K. M. & Graebner, M. E.,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pp. 25~32.

(15) Firestone, W. A., 1993, Alternative Arguments for Generalizing From Data as Applied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2(4), pp. 16~23.

(16) Gephart, R. P.,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4), pp. 454~462.

(17)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Wiedenfeld and Nicholson.

(18) Lee, T. W., 2001,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2), pp. 215~216.

(19) Markus, M. L. and Robey, D., 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Causal Structure in Theory and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34, pp. 583~598.

(20) Maxwell, J. A.,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Sage Publications.

(21) Miles, M. B. and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CA.

(22) Mohr, L. B., 1982,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CA.

(23) Ozcan, P. & Eisenhardt, K. M., 2009, Origin of Alliance Portfolios: Entrepreneurs, Network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2), pp. 246~279.

(24) Santos, F. M. & Eisenhardt, K. M., 2009, Constructing Markets and Shaping Boundaries: Entrepreneurial Power in Nascent Fiel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4), pp. 643~671.

(25) Strauss, A.,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Second Editi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26)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 Sage Publications.